DOI: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5.05.101

法德英关系与欧洲一体化(1945—1993)

姜 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 要] 法国、德国、英国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对欧洲一体化的启动、扩大和深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法德和解为战后西欧一体化扫除了障碍,奠定了政治基础。60年代到70年代初,法英的矛盾与冲突导致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过程一波三折,使欧洲共同体的扩大整整推迟了十年之久。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的背景下,法德之间的合作对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欧洲一体化; 法德关系; 法英关系

France-Germany-Britain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1945 - 1993)

Jiang Nan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 among France, Germany and Great Britain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Early 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basic policies of France towards Germany were to dismember and weaken it. Soon after, the prologue of the Cold War was ensued as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U. S.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ollapsed. The Cold War put West Europe onto the forward position, the Soviet Union replaced Germany as the supreme menace to France, and Germany served France as the protective screen to the threat of the Soviet Union. Under this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Franch policy towards Germany transformed from hostility to reconcili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plit of Germany dispelled France's alert mind for the moment and laid realistic basis for their reconciliation. As a result, in 1950s,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France and Germany was achieved and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post-war European integration was laid down.

In 1960s, France vetoed twice the proposal of Britain for the entry of European Community, the reasons being as follows: First, the French president Charles de Gaulle doubted the determination of Britain for its economic integration into the Common Market, and doubted its determination of abandoning traditional policies and the British Imperial Preference; Second,

[收稿日期] 2015-05-10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5-06-30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33-6000/C

[作者简介] 姜南(http://orcid.org/0000-0002-4825-2085),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欧洲一体化史研究。

President Charles de Gaulle was reluctant to accept Britain before the accomplishment of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for European Community; La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e initial conceiving of President Charles de Gaulle was to establish "Europeans' Europe" led by France and centered in France and Germany.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 of President Charles de Gaulle was to regain a great power status for France in Europe and even in the world, and obviously, Britain was the key force to drag Europe into the track of the Atlantic Community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Until late 1960s, when West German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rength boosted distinctively, and 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have been shaped up, President Georges Pompidou decided to accept Britain as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o balance the German power. The conflicts between France and Britain led to the ups and downs of Britain concerning its late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lso the expanding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lapse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unification of Germany, the European Community countries headed by Franc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Germany's promise of sticking to the Europe integration. To be specific, the position of Germany towards the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 especially towards the negotiation time-table of the EMU, was the wind vane. After repeated negotiations and running, at the special Summit in Rome in 1990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he attending countries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Germany to the time-table issue of EMU. In December 1990, France and Germany put forward a joint proposal concerning the political union. Consequently, the France-Germany cooperation was of crucial importance for the signing of the Maastricht Treaty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Key words: European integration; France-Germany relation; France-Britain relation

在世界上诸多区域一体化的实践中,欧洲一体化以其一体化程度最高、成就最显著而著称。今天,欧盟已经有28个成员国,人口超过5亿。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受到大国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篇幅所限,本文仅探讨西欧大国(即法德英三国)关系与欧洲一体化的密切关联,美苏两个大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在此不再进行专门论述。目前国内史学界已有一些关于欧盟成员国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成果,其中,单篇论文以探讨一体化早期发展史居多,但多是就某个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时间跨度一般不大;专著不多,关于英国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有几本,关于德国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有一本。而对于法德英关系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进行综合、系统的分析,且涉及20世纪后半叶近五十年时间的论文,笔者尚未见到[①]。

首先要对"欧洲一体化"和"德国"的概念做一说明。"欧洲一体化"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① 关于德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主要论文有:吴友法《"德国问题"与早期欧洲一体化》,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4期;黄正柏《阿登纳的欧洲联合政策及早期实施》,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邢来顺《德法关系的历史发展与欧洲联合》,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2期。专著有一本:张才圣《德国与欧洲一体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关于法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主要论文有:黄正柏《从"莫内的欧洲"到"祖国的欧洲"》,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周荣耀《戴高乐主义论》,载《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关于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主要论文有:黄正柏《英国为什么申请十年之后才加入西欧共同市场》,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黄正柏《英国在欧洲联合初期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坚持》,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专著有:洪邮生《英国对西欧一体化政策的起源和演变(1945—196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怀普《英国与欧洲一体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马瑞映《疏离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后从西欧开始的、以建立超国家机构为特征和起点的欧洲民族国家的联合进程。这种一体化要求创立诸如“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的超国家组织，各成员国向超国家组织让渡部分政策的决策权，并受到该组织的一定约束，以区别于一般的政府间合作[1]7。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欧洲一体化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开始建立起超国家组织。欧洲一体化首先从西欧开始，后扩展到南欧和中东欧。但是，当欧洲一体化第一个具有超国家性质的组织“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时，就使用了“欧洲”一词，而且其章程规定这是一个“其他欧洲国家都可以加入”[2]102 的开放性组织。以后也一直沿用了“欧洲”的概念，而没有使用 “西欧”概念。因此，本文沿用这一约定俗成的用法。

“德国”概念本来无须说明，但由于 1949 年德国分裂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个国家，1990 年 10 月两德又重新统一，所以需要加以说明。德国分裂后参加欧洲一体化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因此本文的“德国”大部分时间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在 1945 到 1949 年之间是指分裂前的德国，1990 年 10 月以后指统一后的德国。

一、法德和解与欧洲一体化的启动

战后欧洲一体化是以法德两国的和解与合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战后初期，法国外交政策有两个基本特征：削弱德国和在美苏之间奉行中间政策。与德国和解并与德国一起推进欧洲一体化，并没有纳入法国的对外政策目标。

1945 年 9 月，美、英、苏、法外交部部长在伦敦会晤，法国正式提出自己的对德方案。方案内容包括：第一，不允许重建中央集权的德意志国家，反对德国建立全国性的政党和中央行政机构。第二，莱茵兰即莱茵河左岸地区脱离德国。科隆以南是入侵法国的通道，应该由法国永久占领；科隆以北的区域应该由荷兰、比利时甚至英国共同管辖。第三，实现鲁尔国际化，实现萨尔与法国的经济融合。此外，法国还要求大量赔款和拆迁德国工厂，以补偿法国的战争损失。这些主张形成法国战后对德政策的“法国方案”[3]15。可以看出，“法国方案”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肢解德国、削弱德国。

“法国方案”几乎得到法国从极“左”到极右各个政党的一致支持，但却遭到美、英、苏三国的一致反对。1947 年 3 月到 4 月，美、英、苏、法四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否决了把鲁尔和莱茵兰从德国分离的提议，拒绝建立一个非中央集权的联邦制国家，并故意对法国关于萨尔的要求不置可否。美英代表比苏联的态度稍微缓和一些，他们同意萨尔与法国的经济融合，还答应由美英向法国供应德国煤。但是，对于肢解德国的方案却坚决反对。

莫斯科会议首先标志着“法国方案”的失败和法国对德政策受挫。其次，由于莫洛托夫反对法国的对德方案，法国逐渐远离苏联，站在美英一边。法国在东西方之间奉行中间政策的方针遭遇挫折，选择站在西方一边的政策初见端倪。最后，莫斯科会议受到“杜鲁门主义”出笼的影响，美苏对立加剧，其后美苏关系逐步陷入“冷战”的危机，这使法国试图在东西方之间充当仲裁人的设想客观上也不可能。

1947 年 3 月 12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国会授权向希腊、土耳其提供四亿美元的援助，并得到国会的支持，杜鲁门主义出台。它既是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标志，同时也是美国全球扩张战略的一个宣言。美国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出发，推行复兴欧洲、扶植德国的欧洲政策。同年 6 月 5 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说，提出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很显然，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态度与法国提出的肢解德国、削弱德国的主张背道而驰，法国必须做出选择。1947 年 10－12 月，法国已经接受了美国 3.37 亿美元的紧急援助，1948 年 1 月 2 日又接受了 2.84 亿美元[3]20。在经济上仰仗美国援助的法国，不得不放弃在美苏之间充当“第三种力量”的政策，倒

向美国。

1948年2月,美、英、法、荷、比、卢六国代表在伦敦讨论德国问题,把苏联排斥在外,称"六国伦敦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成立联邦德国政府,最后达成了"伦敦协议":召开西方占领区德国制宪会议,制定宪法,以便1949年成立联邦制而非中央集权的联邦德国政府;规定鲁尔的煤和钢由六国与联邦德国共管。"伦敦协议"几乎否定了"法国方案"的所有重要原则。但是,法国在萨尔问题上得到满足后,还是同意了"伦敦协议"的条款。而后法国国民议会对是否批准法国同意该协议的讨论异常艰难,最后仅以8票的优势(297票对289票)批准了协议。协议为联邦德国的建立扫清了障碍。1949年8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宣告成立,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宣告成立。从此,德国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并各自纳入东西方两大阵营。

法国批准"伦敦协议"标志着它放弃了在美苏之间充当仲裁人的政策,明确选择了西方阵营。在德国问题上,法国同意成立联邦德国,标志着法德关系实现了从对立到缓和、从敌对到和解的转变。

1957年3月,六国在罗马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这两个条约合称《罗马条约》。1958年,《罗马条约》正式生效,欧洲一体化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63年1月22日,阿登纳总理访问巴黎时签署了《法兰西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法德合作的条约》,又称《爱丽舍条约》。《爱丽舍条约》使法德关系法律化和制度化,法德合作关系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基础,正如在戴高乐和阿登纳在科隆贝会晤后的两国宣言中所说,"我们坚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的紧密合作将是欧洲一切建设事业的基础"[4]30-31。

法德和解与合作是欧洲早期一体化的发动机,它为战后西欧的一体化扫除了障碍,奠定了欧洲联合的政治基础。它不仅是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也是欧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没有法德的和解与合作,欧洲一体化进程不可能顺利推进。

笔者认为,法德和解与合作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战后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战后不久,美苏两国结束了战时联盟关系,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冷战"把西欧推到美苏对峙的前沿阵地,西欧各国的生存环境恶化。法德成了同一阵营中被削弱了的中等国家,它们都要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因此化解宿怨、实现和解与合作成为法德两国的共同需要。对法国而言,"冷战"使苏联取代德国成为威胁法国的新对手,法国安全防务的主要目标从德国转向苏联,与法国和解后的德国将成为法国抵御苏联威胁的屏障。法国从法苏同盟遏制德国变为法德共同遏制苏联,法国把德国当作同苏联对抗的可以团结和利用的一方力量。因此,法国的对德政策从肢解、敌对转变为和解、合作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第二,美国的欧洲和德国政策对法国的重大影响。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出发,推行扶植德国的政策。法国在经济上依赖美国援助,政治和军事上仰仗美国的支持和保护,不可能推行与美国政策背道而驰的对德政策。

第三,德国的分裂为法德和解提供了现实基础。德国的分裂让这个昔日的庞然大物变得弱小,使法国暂时打消了对德国挥之不去的戒备之心,法德之间的和解成为可能。正如戴高乐所说:"在分裂之后,德国作为一个称霸的和强大可畏的强国已不复存在。"[5]171

第四,法国也意识到,把德国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是对德国的最好控制,是消除德国威胁的最好办法。

对联邦德国而言,摆脱战败国的低下地位是战后的当务之急,在依赖美国保护的同时,以相对平等的地位加入到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去,无疑脱去了战败国的紧箍咒,是求之不得的事情,符合联邦德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德国支持欧洲一体化是顺理成章、不言而喻的。

二、法英关系与欧洲一体化的延迟扩大

在法德终于实现和解，欧洲一体化艰难起步之后，英国加入共同体的问题长期成为一体化事务中的重要问题。在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过程中，法国因为两次否决英国的申请而使英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这一时期的焦点。法国的两次否决不仅对英国加入共同体产生了影响，也对共同体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它使共同体的扩大推迟了十年。

在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早期，英国政府不仅拒绝了舒曼计划，而且也放弃了加入共同市场。然而，1961 年 8 月 9 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62 年 2 月 28 日，又提出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申请。但是，1963 年 1 月 14 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否决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申请。同年 1 月 29 日，共同体与英国的谈判正式宣告失败。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第一次申请就这样夭折了。

1967 年 5 月 11 日，英国工党政府第二次提出了加入共同市场的申请。但是，在 11 月 27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再次拒绝了英国。戴高乐说明了法国拒绝英国的原因。他认为，英国在经济上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尤其在农业方面不同："英国人民取得食物的方法，实际上是从南北美洲或从旧自治领廉价购买粮食进口的方法，同时还要给予英国农民以大量的补贴，这种方法显然是与六国为它们自己自然而然地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不相容的。"[6]410 英国的传统农业政策与共同农业政策的价格支持政策大相径庭，戴高乐对英国能否放弃自己的传统和英联邦的特惠制，真正从经济上融入共同市场表示怀疑。

在列举了经济上的原因后，戴高乐又说明了政治上的原因。他认为，英国加入共同体之后，自由贸易区的其他国家也会加入，这样的共同市场与六国建立的共同市场将截然不同：

> 可以预料，参加的成员这样多、这样复杂的一个集团，其内部团结是不会维持长久的，而且最后终究将会出现一个依附美国并在美国领导下的庞大的大西洋共同体，而且它将很快地把欧洲共同体吞掉。
>
> 有些人看来，这可能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假定，但是这决不是法国所希望做的，也不是它所做的。而法国的希望，法国在做的，是建设地道的欧洲。[6]411

戴高乐的理由当然不止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所说的那些。在共同农业政策问题上，戴高乐不愿在该政策未制订完成前让英国加入。《罗马条约》规定实施一项共同农业政策，把共同市场扩大到农业和农产品贸易。但是，由于农业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罗马条约》并没有规定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步骤和具体方案，这些工作留待条约生效两年后草拟。条约生效后，联邦德国等国对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采取能拖就拖的办法，使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一波三折，进展缓慢。戴高乐很清楚农业和农业共同市场对法国的重要性："显然，农业在我们国家的整个活动中，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不能设想有这样一个共同市场，法国农业在其中找不到适应它的生产的市场。而且我们认为在六国中，我们在这方面是具有最迫切需要的一个国家。"[6]409 英国国内农业部门早在 1961 年就明确表示，希望在共同农业政策还在制订的时候加入共同体，以便对共同农业政策施加影响。在共同农业政策未制订完成时让英国加入共同体，等于多增加一个共同农业政策的反对派，对法国迫切需要的共同农业政策是个很大的威胁，可能会影响到共同农业政策的形成。因此，法国并不希望英国在此时加入共同体。

农业方面的矛盾固然是法国拒绝英国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戴高乐欧洲政策的特点是要建立"各国的欧洲"和"欧洲人的欧洲"。"各国的欧洲"针对的是"超国家的欧洲"，"欧洲

人的欧洲”则是针对美国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而说的。“各国的欧洲”与“欧洲人的欧洲”是相互关联的。戴高乐认为只有“各国的欧洲”才有可能成为“欧洲人的欧洲”,而超国家的欧洲只能依附于美国。在1962年5月15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公开指责超国家欧洲的拥护者是在替美国办事。

实际上,戴高乐的设想是建立以法德为核心、以法国为领导、排除美英影响的“欧洲人的欧洲”,其根本目的是恢复法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大国地位。而英国恰恰是可能把欧洲拖入美国主导的大西洋共同体中的力量。戴高乐不会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曾经对他讲过一句名言:“您要知道,如果我必须在您和罗斯福之间作一选择时,我总是选择罗斯福的。您还要知道,当我必须在欧洲和大海之间做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大海的。”[4]50英国对美国的亲近感和对欧洲大陆的距离感使戴高乐怀疑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诚意和效果。戴高乐认为,英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它在关键时候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欧洲的利益而为大西洋利益服务,导致最后出现一个美国领导下的大西洋共同体。

事实上,戴高乐没有看错,麦克米伦首相并不打算使英国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他并不讳言英国人要坚持“大西洋联盟”,坚持大西洋联盟是因为“欧洲不能够单独存在。它必须以平等的、体面的伙伴关系同自由世界的其余部分、英联邦以及美国合作”[7]357。麦克米伦打算一进入共同市场,就着手把它变成西方防御的“第二支柱”,并同美国合作,使之成为扩大的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一部分[8]149。麦克米伦争取到了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支持。1962年,肯尼迪在费城的演说中提出重振大西洋联盟的“宏伟计划”,建议在美国和欧洲经济之间建立公开的贸易联盟,成立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1962年8月,“贸易扩大法”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这项法案建立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假设基础上,美国希望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利用同英国的“特殊关系”,实现自己重振大西洋联盟、领导大西洋联盟的设想。

在防务方面,肯尼迪提出建立北约“多边核力量”,把英法等国的核力量控制在北约手中,也就是控制在美国的手中。1962年12月21日,美英在巴哈马群岛的拿骚举行会晤,就建立“多边核力量”计划达成协议。协议规定,美国向英国提供“北极星”导弹,并帮助英国建造配套的核潜艇和生产核弹头。英国要将这支核潜艇部队拨交北约,置于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指挥之下,但是英国保留在国家的“最高民族利益”受到威胁时收回这些核力量归自己支配的权力。肯尼迪写信告诉戴高乐将军,法国可以享有类似英国的安排,建议他购买“北极星”导弹[9]161。但戴高乐认为这是美国控制英法核武器的手段,参加北约的多边力量将使法国无法拥有自己独立的打击力量[2]272。戴高乐对英国十分失望:“英国把它仅有的一点原子力量交给了美国人。它很可以把它交给欧洲。但它做了自己的抉择。”[9]207-208他认为,拿骚协议证明英国在美国和欧洲之间选择了美国,而非欧洲。在拿骚会议前戴高乐就考虑阻止英国加入共同体,拿骚协议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借口。当时担任英国驻法国大使的皮尔森·狄克逊证实了这一点[10]299-300。

由于戴高乐将军两次把英国挡在共同市场门外,威尔逊首相对英国加入共同体丧失了信心:“只要戴高乐将军还在爱丽舍宫,我们(英法)之间的关系将极难恢复。”[11]267对此,戴高乐也不讳言:“英国有朝一日将加入共同市场,(但)毫无疑问那时我将不在位了。”[12]170

1969年4月,戴高乐辞去法国总统职务,蓬皮杜当选为总统。当时联邦德国实力明显增强,加上它推行“新东方政策”后,大大拓宽了对外关系,加强了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这对法国是一个刺激,蓬皮杜决定同意吸收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平衡联邦德国的势力[13]211。另一方面,共同农业政策经过十年艰苦而漫长的制订过程,已经基本定型。1968年7月1日,欧共体六国取消了成员国间在大部分农产品上的贸易限制,制订了统一的价格,建立了共同的对外农产品关税壁垒,提前18个月实现了建成共同农业市场的目标,法国对英国有可能干扰共同农业政策的担心不复存

在。1969 年 12 月，法国总统蓬皮杜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国首脑会议上倡议扩大共同体，为英国加入共同体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1970 年 6 月，爱德华·希思领导的英国保守党上台执政后仅仅 12 天，即 6 月 30 日，希思政府同六国开始了谈判。1972 年 1 月 22 日，英国、丹麦、爱尔兰和挪威在布鲁塞尔签署了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1973 年 1 月 1 日，条约正式生效。英国终于加入了欧共体，而这时离英国第一次提出申请已经十年有余。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法英这两个大国关系不好的时候，曾长期阻碍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使共同体的扩大延迟了十年之久；关系好的时候，则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三、法德合作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倒塌，曾经长期停滞的德国统一问题重新燃起了希望。此时，德国问题在两种意义上同欧洲一体化密切相关。其一，如果德国统一，原民主德国将作为新德国的一部分进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之中；其二，欧洲一体化的深化需要欧洲最大的国家德国的支持。

影响法国对德国态度的有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德国如果重新统一，人口接近 8 000 万，国民生产总值为 1.4 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以法国为首的欧共体国家自然会心生疑虑：统一后的德国会不会把欧洲变成德国的欧洲呢？德国还会继续忠实于欧洲一体化吗？法德两国还能成为一体化的轴心国家吗？英国也有多家媒体发表了评论，如《每日快讯》说："重新统一对德国人民而言已经不再是幻想，然而它对于德国之外的许许多多的人，不管是民主世界的也罢，共产党世界的也罢，还仍然是一场梦魇。"[14]274

为了打消法国和其他成员国对统一后的德国所持的怀疑和害怕心理，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很坚决地表示，德国的统一和欧洲一体化不矛盾，而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的；而且，德国尤其要优先考虑与法国保持积极的关系，把法德友好关系作为德国欧洲政策的基础。1989 年 11 月 18 日，法国总统密特朗邀请共同体所有成员国首脑在巴黎会晤。科尔在 12 国晚宴上"长时间地发挥他所捍卫的论点：德国统一和欧洲统一是不可分的"[15]249。11 月 22 日，科尔又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重申，德国统一和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必须紧密联系在一起。1990 年 12 月 19 日，他仍说："德国的房子——我们共同的房子——只能在欧洲的屋顶下建设。这是我们的政策目标。"[16]450

德国虽然有了这样的表态，但法国是否能够理解德国，并且支持德国的统一，还需要在复杂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中互相磨合。这种磨合最集中地表现在《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签订的过程上。1992 年 2 月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最重要的内容是达成了关于欧洲政治联盟和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协议。

1979 年 3 月 13 日，在法国总统德斯坦和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的倡导和推动下，共同体 9 国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使欧共体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在走向经济和货币一体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欧洲货币体系也有消极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联邦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和最稳定的货币，联邦德国及其独立的联邦银行实际上获得了欧洲的货币主导权，法国对此十分愤怒。法国希望采用共同管理的欧洲货币，与联邦德国分享货币主导权。因此，创建超国家的货币制度以实现对德国货币政策的控制就成为法国政府的中心任务[16]436。

1988 年 6 月，欧共体在汉诺威举行峰会，决定组织一个以德洛尔为主席的委员会，委员会由欧共体 12 国的中央银行行长组成，其任务是研究货币联盟的可能性。1989 年 4 月，这个委员会公布

了一个计划,即著名的“德洛尔计划”,计划规定经由三个阶段来实现完全的经济与货币联盟(EMU)①。法国当然是坚决支持该计划的。在1989年6月举行的马德里欧洲理事会上,“德洛尔计划”得到了各国首脑的认可。

但是,联邦德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反对货币联盟的,它们认为货币联盟会对联邦银行的权力造成威胁,因此主张把精力放在单一市场计划的完成和货币联盟的第一阶段上。在1989年12月8日召开的斯特拉斯堡峰会前几天,科尔总理给密特朗总统写了一封信,不赞成就经济与货币联盟召集政府间会议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而且他提议的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时间表比法国人的更慢。科尔还表示,德国赞成共同体的政治制度改革,尤其主张加强欧洲议会的权力,而这与法国的想法正好对立。科尔的信让法国政府很震惊,法国警告德国政府,两国关系处于危机之中。

在斯特拉斯堡峰会举行前几小时,法德之间终于达成了妥协。科尔同意了法国在1990年下半年就经济与货币联盟召开政府间会议的要求。法国也做出了让步,同意把会议推迟到12月2日的联邦德国选举之后;联邦德国还获得了一个让步,即只要德国的统一是在欧洲一体化的环境下进行,将获得法国和其他成员国对单一德国国家的支持。法德关系破裂的风险被避免了。

尽管法德两国在斯特拉斯堡峰会上达成了妥协,但他们围绕德国统一问题的矛盾并没有就此消除。早在1989年7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就对德国的统一表示了理解。但是,7月27日,密特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统一只能‘和平地、民主地’实现”。密特朗认为,为了捍卫和平,必须解决五大困难:德国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而且立即由联邦德国承认;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就移交权力给统一的德国达成协议;德国放弃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德国继续归属于大西洋联盟;确认德国对欧洲共同体的承诺[15]219。12月6日,密特朗访问苏联时在基辅发表讲话,警告德国不要强力推进统一,因为这样做会打破欧洲的政治均势,并对欧洲一体化产生负面影响。他指出,在德国统一之前就应该实现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②。12月19日,密特朗访问民主德国。密特朗在莱比锡重申了法国的警告,“德国人民在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前夕,应该考虑到欧洲的均势”,“德国统一与欧洲统一应同步进行”[15]273。联邦德国认为这次访问是法国试图支撑一个正在迅速崩溃的民主德国,并因此而推迟德国的统一进程。德国人还相信,12月16日,密特朗在法属加勒比圣马丁岛上向美国总统布什肯定地表示过,对任何形式的德国统一,法国都积极主张向后推迟[14]287。

1989年11月的最初9天,平均每天有9 000个民主德国人绕道捷克斯洛伐克去联邦德国,柏林墙已经形同虚设[17]292。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此后三个月,平均每天仍然有2 000个民主德国人去联邦德国[17]294。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局面,领导人难以驾驭,不得不由反对德国统一转为同意德国统一。统一成为两个德国的共同选择。

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举行全民选举。德国联盟是在科尔的鼓动下,由三个党派即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和“民主觉醒”联合组成。它是联邦德国执政的基民盟和基社盟的姊妹党,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联盟主张民主德国以州建制加入联邦德国,而民主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姊妹党,主张两个德国平等地通过公民投票来实现德国统一[18]226-227。联邦德国各政党都全力以赴支援民主德国的姊妹党,科尔更以提供几十亿马克的援助等优厚条件来支持德国联盟。在基民盟的强力支持下,德国联盟获得了3月18日选举的胜利,并与自由民主联盟联合组阁,为科尔按其设想推动德国统一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

法国看到德国的统一已不可避免,终于十分明智地不再节外生枝了。法国外交部部长罗兰·杜

① 参见 http://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euro/emu/road/delors_report_en.htm。

② 转引自 M. J. Baun,"The Maastricht Treaty as High Politics: Germany, France,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0, No. 4(1995-1996), p. 614。

马发表声明，敦促波恩吸收民主德国，尽快完成统一进程，以便波恩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共同体事务上来。

法德的合作推动了欧洲共同体的快速发展。1990 年 4 月 19 日，经过数周的秘密讨价还价之后，科尔和密特朗给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寄去了一封联名信。在信中他们不仅提议加速货币联盟的步伐，而且主动提出了建立一个政治联盟的新倡议[16]450。联名信建议在货币联盟的政府间会议之外，再为政治联盟召开一个政府间会议。1990 年 4 月 28 日，在都柏林举行的欧洲理事会特别会议通过了经济与货币联盟谈判的时间表。6 月 25—26 日，在都柏林举行共同体常规峰会，各国首脑们正式同意就政治联盟召开政府间会议，并宣布经济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谈判都将于 12 月中旬开始。

启动经济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两个平行的政府间会议是法国和其他成员国的显著成就。他们一直急切地希望德国能对经济与货币联盟做出承诺，现在终于获得了成功。10 月 27－28 日，共同体的罗马特别峰会决定，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第二阶段应该从 1994 年 1 月 1 日开始，内容主要包括完成 1992 年单一市场计划，并成立一个欧洲货币机构。第三阶段将在第二阶段启动后的三年内开始，届时将使各国的中央银行独立，并对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加以限制。这些决定虽然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关于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大致轮廓和时间表都有了①。12 月 7 日，科尔和密特朗提出了一个联合议案，为政治联盟的谈判设定了轨道，其中心是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并推动共同防务。此外，议案还倡导在国内安全与警务问题上加强政府间合作。国内安全与警务是德国政府提出的创意，并得到了法国的支持[19]58。这个联合议案对法国和德国政府来讲，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法德两国在经历了德国统一的检验后，又一次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主动力。

1992 年 2 月 7 日，在荷兰城市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欧共体峰会上，《欧洲联盟条约》正式签订(故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 年 11 月 1 日，《马约》正式生效。《马约》确定了欧洲联盟的柱形结构：第一支柱为原有的三个共同体，第二支柱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第三支柱为加强内政与司法事务的合作。条约把欧洲经济共同体更名为欧洲共同体，成为欧洲联盟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第一支柱中，条约还设立欧洲联盟公民资格，详细规定了实现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日程表。《马约》对共同体的机构和决策程序进行了修改，扩大了欧洲法院和欧洲议会的权力，以及部长理事会中特定多数表决制的适用范围。第二支柱是建立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成员国同意通过西欧联盟来实行共同的防务政策，采取共同行动时要求全体一致同意。第三支柱是针对欧盟国家在移民、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开展内政和司法方面的合作。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都采用政府间合作的方式。《马约》标志着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

可以看出，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的背景下，法德两国彼此妥协与合作对 1992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法国、德国、英国这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系好则进程快，关系不好则进程慢。反过来，一体化进程又深刻影响了法德英三国关系。这对现在与未来其他地区的一体化或者多边合作具有重要启示：一体化区域内的大国往往是决定该区域政治经济格局的关键因素，因此，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体化大厦的基础和梁柱，一体化发展的龙头；大国之间求同存异，追求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共同推动合作进程，是明智的选择；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利益格局的变化，大国不能因循僵化，而是要根据需要及时调整政策；一体化是构建和平合作的大国关系的有效途径之一。

---

① D. Buchan & J. Wyles,"Thatcher Left Trailing as a Summit Fixes EMU Date," *Financial Times*, 1990－10－29, p. 1, 转引自 M. J. Baun," The Maastricht Treaty as High Politics: Germany, France,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0, No. 4 (1995－1996), p. 618。

[参 考 文 献]

[1] M. J. Dedma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45－1995, London: Routledge, 1996.

[2] [法]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丁一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P. Gerbet,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trans. by Ding Yifan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9.]

[3] F. R. Willis, *France, Germany, and the New Europe*, 1945－196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4] [法]罗歇·马西普:《戴高乐与欧洲》,复旦大学世界历史系世界史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R. Massip, *Charles de Gaulle and Europe*, trans. by Group of World History in World History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3.]

[5] [法]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复兴,1958—196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C. de Gaulle, *Hope Memoirs*, *Vol*. 1: *Renaissance*, 1958－1962,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3.]

[6]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1958年5月—1964年1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 *Speeches of Charles De Gaulle*(1958－1964),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1964.]

[7] [英]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第6卷:从政末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H. Macmillan, *Macmillan Memoir*, *Vol*. 6: *At the End of the Da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0.]

[8] [英]阿伦·斯克德、[英]克里斯·库克:《战后英国政治史》,王子珍、秦新民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A. Sked & C. Cook, *Past-war Britain: A Political History*, trans. by Wang Zizhen & Qin Xinmin, Beijing: World Knowledge Press, 1985.]

[9] 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Zhang Xichang & Zhou Jianqing, *The French Diplomatic History after the War*, Beijing: World Knowledge Press, 1993.]

[10] P. Dixon, *Double Diploma: The Life of Sir Pierson Dixon Don and Diplomat*, London: Hutchinson, 1968.

[11] 《威尔逊及其对外主张》编译组编译:《威尔逊及其对外主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Compiling Group of *Wilson and His Foreign Claims*(ed.), *Wilson and His Foreign Claim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5.]

[12] D. W. Urwi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Longman, 1997.

[13] S. R. Gildea, *France since*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 [德]维尔纳·马泽尔:《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传》,潘琪昌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W. Maser, *Biography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Chancellor Helmut Kohl*, trans. by Pan Qichang et al., Beijing: The Oriental Press, 1991.]

[15] [法]弗朗索瓦·密特朗:《被死神打断的回忆——密特朗回忆录》,曾令保、沈忠民、樊赤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F. Mitterrand, *The Interrupted Memoirs*, trans. by Zeng Lingbao, Shen Zhongmin & Fan Chi, Beijing: China Book Press, 1998.]

[16] P. Gerbet, *La Construction de l'Europ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94. [P. Gerbet (ed.),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Paris: National Press, 1994.]

[17] [英]玛丽·弗尔布鲁克:《德国史:1918—2008》,卿文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M. Fulbrook, *A History of Germany*: 1918－2008, trans. by Qing Wenhu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18] 朱忠武:《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Zhu Zhongwu, *German Chancellor Helmut Kohl*,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

[19] G. Saunier,"La négociation de Maastricht vue de Pari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History*, Vol. 19, No. 1(2013), pp. 45－65. [G. Saunier,"The Negotiation of Maastric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i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History*, Vol. 19, No. 1(2013), pp. 45－65.]

